

研究論文

抗爭表演的視覺框架：中國網絡名人的實踐經驗

林仲軒

摘要

抗爭政治研究對理解急劇變遷時期的中國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其中，以「視覺」為中心的抗爭表演研究是近年湧現出來的一個重要研究取向，嘗試為越來越多的抗爭表演提供新的解釋機制。這一研究取向主要是基於西方傳統抗爭表演研究，關注抗爭者在中國特定政治機會結構下如何通過圖像和媒體等視覺手段實現其在地化的抗爭表演。既有研究貢獻了很多有價值的案例研究，但還沒有基於案例研究形成系統的、操作化的分析框架。因此，本研究將具體以網絡名人的抗爭表演實踐經驗為案例，基於虛擬民族誌式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的研究方法，從圖像、媒介、身體和空間等具體面向，考察互聯網時代中國政治機會結構下抗爭表演的視覺實踐邏輯和理論內涵，並在此基礎上為抗爭表演研究建構一個可能的視覺分析框架。

關鍵詞：抗爭、表演、名人、葉海燕、視覺

林仲軒，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研究興趣：政治傳播、互聯網文化研究、新媒體與殘障研究。郵箱：lzhongx55@sina.com

論文投稿日期：2017年8月2日。論文接受日期：2018年6月26日。

Research Article

A Visual Frame of Contentious Performance: Chinese Internet Celebrity's Practical Experience

Zhongxuan LIN

Abstract

Contentious politics research is of vital importance to understand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rapid change. The research on contentious performance from a visual approach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route emerging in recent years which attempts to provide a new explanation mechanism for more and more contentious performances in China. This research approach is mainly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Western researches on contentious performance, and focuses on how protestors situated in China's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perform protest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visual means of images and media. This approach has contributed many valuable case studies, but there are still not any systematic, operational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s emerged from these case studies. Based on research methods of ethnographic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is article, therefore, uses Ye Haiyan, a Chinese internet celebrity, as a case study, and focuses on her contentious practices, to illustrate and interpret the practical logics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contentious performance from a visual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also proposes a possible visual framework for future researches on contentious performance.

Keywords: protests, performance, celebrity, Ye Haiyan, visual

Zhongxuan LIN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Jinan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ternet cultural studies, new media & disability.

A Visual Frame of Contentious Performance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Lin, Z. (2019). A visual frame of contentious performance: Chinese internet celebrity's practical experience. *Communication & Society*, 49, 175–202.

致謝

作者感謝兩位匿名評審及編輯部對本文提出的建設性意見和建議，並對受訪者葉海燕女士致以由衷的謝忱。本研究得到2017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視覺修辭的理論、方法與應用研究」(17ZDA290)資助。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9期(2019)

研究動機與目的

2016年12月，由華裔年輕女導演王男猷拍攝的講述2013年中國網絡名人葉海燕(網名「流氓燕」)抗議「海南小學校長性侵六名女生」事件的紀錄片《流氓燕》，成為角逐2017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的15部紀錄片之一。紀錄片通過視覺的方式展現了互聯網時代非常有中國特色的抗爭表演實踐。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進入了一個物質繁榮和社會轉型的時期，同時進入了一個社會矛盾、社會抗爭集中爆發的時期。因此，社會抗爭研究，或者說對涵蓋了社會革命、社會運動、集體行動等內涵的抗爭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研究(Tilly & Tarrow, 2006)，對理解急劇變遷時期的中國有至關重要的意義，成為一個重要而又經典的研究問題，吸引眾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和取向進行探討(趙鼎新, 2005; Cai, 2010; Chen, 2012; Goldman, 2005; O'Brien, 2009; Perry & Goldman, 2009)。其中，一個重要研究取向就是突顯中國抗爭政治特殊的政治機會結構在制約集體政治行動的同時也提供了可供選擇的行動方案(趙鼎新, 2005; 黃冬姪, 2011)，因此，抗爭者得以在國家與社會的雙向協商與調適過程中打開一個曖昧的抗爭空間，即通過以「視覺」為中心的抗爭表演以爭取相對安全的機會自下而上地對宏觀體制做出微妙回應和特殊表達(劉濤, 2016a; Chen, 2012)。這一研究取向主要是對西方「抗爭表演」研究的實證運用、案例延伸和理論提煉，並進一步捕捉到在地化的「視覺」表演特徵，指向一種新的解釋機制(王蒙, 2013; 郭小安、劉明瑤, 2016; 黃振輝, 2011; 劉濤, 2016a, 2016b, 2017)。

但是，既有研究更多的是關注抗爭表演視覺「可視」(visuality)的問題(圖像與媒介)，對視覺「可見」(visibility)的問題(身體和空間)缺乏相應的深入研究，而這些要素都是一個系統的「視覺」分析框架應該全面考慮的(劉世鼎、史唯, 2017; Butler, 2011; Guidry, 2003; Juris, 2012; Mitchell, 2012; Rovisco & Veneti, 2017)。實際上，紀錄片《流氓燕》便是雜糅了圖像、媒體、身體、空間等要素的一個視覺文本；葉海燕的每次抗爭表演也都是圖像、媒體、身體、空間等要素的協同實踐。

因此，本研究以網絡名人葉海燕這一視覺標誌為原點，從「視覺」

抗爭表演的視覺框架：中國網絡名人的實踐經驗

的角度介入中國抗爭政治研究。具體而言，本研究將討論葉海燕如何以「視覺」為主線，圍繞圖像、媒體、身體和空間展開其獨特的抗爭表演，這種抗爭表演又有何內在的實踐邏輯和理論內涵。在此基礎上，本研究嘗試為抗爭表演研究建構一個可能的視覺分析框架，期望回答互聯網時代中國政治機會結構下抗爭表演的視覺實踐如何展開的問題。

文獻綜述

「國家中心」政治機會結構下的抗爭表演

以社會抗爭和社會運動研究為主的抗爭政治研究作為社會學的重要分支，已經有社會學家提出了各種理論解釋其產生和發展的機制 (Gurr, 1970; McAdam, 1982; McCarthy & Zald, 1977; Tilly, 2000, 2008)。而誠如 Doug McAdam (1982, p. 36) 所言，「社會運動理論背後總有一個更廣義的制度政治模型」。這個制度政治模型，或者說政治機會結構，主要指涉社會抗爭和社會運動所處的政治環境以及置身其中的運動參與者和抗爭者所能獲得的外部資源，強調政治結構、政治環境和政治背景對抗爭者的抗爭潛力、抗爭策略、抗爭頻率、抗爭機制等的影響 (Tarrow, 1988)。

但是，政治機會結構理論原本只涵蓋城市層面的政治機會結構，並不包括國家層面的制度結構的差異 (Eisinger, 1973)，或者說並不把國家視作社會運動的政治機會結構 (Tarrow, 1998)。有學者對國家的缺席非常不滿，強調國家作為宏觀制度結構對社會運動的決定性影響，因此出現了一波「重回國家」(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的研究浪潮和理論轉向 (Skocpol, Evans, & Rueschemeyer, 1999)，以一種系統主導的結構主義視角，把國家視作完整的、具有凝聚力的單位 (Migdal, 2001)，甚至形成「國家中心」的視角，把社會運動的政治機會結構放置於「國家」的概念體系之下 (黃冬姪, 2011; Tarrow, 1988)。特別是在中國情境下，這種「國家中心」的政治機會結構框架更受重視，被認為是社會運動和社會抗爭成功與否的決定性因素 (Cai, 2010; Yang, 2016)。在中國特定的政治體制下，「國家」甚至被直接等同於「政治機會結構」，並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9期(2019)

基於「威權體制」的刻板印象，得出在「國家中心」的機會結構下抗爭機會脆弱、抗爭資源匱乏的結論(趙鼎新，2005)。

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社會經濟的發展，分散的社會利益群體與地方政府、中央政府間出現越來越多的利益衝突，各種社會抗爭在90年代開始爆發起來，標誌著中國進入了抗爭時代(Tai, 2015)。相應地，國家的權力結構和抗爭的機會結構也發生了變化，進入了所謂威權與抗爭並存的「抗爭的威權主義」(contentious authoritarianism)(Chen, 2012, p. 189)，並且展現出了其特有的韌性，開始容納、適應、適調越來越廣泛而常規的社會抗爭(Nathan, 2003)。儘管政府調適和社會發展為民間自發組織的社會抗爭提供了越來越多的空間和資源，一定程度上脫離毛時期國家權力的緊密組織和編排，但在「國家中心」政治機會結構下，中國的社會抗爭仍然較難動員和發展，而且即使發生也仍然面臨暴力機器剛性壓制的危險(Tai, 2015)。因此，一方面，抗爭者需要更加因應「國家中心」機會結構的抗爭實踐，如「依法抗爭」(O'Brien & Li, 2006)、「以法抗爭」(于建嶸，2008)、「以氣抗爭」(應星，2011)、「以理抗爭」(朱健剛，2011)、「以輿抗爭」(張書軍、單媛，2013)等；另一方面，「國家中心」機會結構也嘗試通過自我適應、自我更新和自我鞏固，策略性地提供特定的抗爭機會(張永宏、李靜君，2012)，使社會抗爭成為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一個模糊的甚至曖昧的地帶，既提供機會結構讓抗爭民眾發出自己聲音，又使他們自我限定進反抗與順從的巧妙平衡之中(Chen, 2012)。

在這種雙向協商、調適的過程中，浮現出一種以「視覺」為中心的特殊的「抗爭表演」模式，即抗爭者的目的並非直接表達訴求的「抗爭」，而是通過圖像化和媒介化特定抗爭劇目進行視覺「表演」(劉濤，2016a)。傳統抗爭政治研究也關注抗爭的這種「表演」屬性，但主要是在抗爭劇目的概念下討論抗爭的視覺表演問題，關注戲劇化的抗爭形式和實踐形態由於其共同的腳本而被模式化地反復演繹而成為固定的抗爭劇目(Tilly, 2006)。比如Tilly(2008)便關注抗爭者如何通過向社會公眾進行抗爭表演而表達不滿、提出訴求，並指出這種抗爭表演的歷史一致性和連續性。Tilly和Tarrow(2006)等人也主要是從抗爭劇目的角度理解某些特定的經典抗爭表演形式為何、如何成為大眾抗爭的主

抗爭表演的視覺框架：中國網絡名人的實踐經驗

導形式。但是，一方面，Tilly 和 Tarrow 等人所研究的集會、罷工、選舉、示威活動、請願遊行、衝擊政府、組織起義等抗爭表演劇目在「國家中心」機會結構下往往會遭受強力壓制而付出慘痛代價，因此，抗爭者需要尋找更策略性的抗爭表演劇目以爭取相對安全的空間（劉濤，2016a）；另一方面，在「國家中心」機會結構下，抗爭者個體的組織資源、經濟資源、政治資源等都非常有限，無法動員集體行動進行抗爭，只能採取低成本的個體抗爭表演，借助創新性的表演劇目吸引媒體介入，將個體問題社會化，最終轉化自己的抗爭為地方官員的壓力，迫使其做出妥協回應（黃振輝，2011）。因此，中國個體的抗爭表演劇目，如下跪、喝農藥、跳樓、跳橋、自焚等，明顯異於 Tilly 等人所研究的集體的大規模集會、示威、遊行等，但又共享「抗爭表演」的內在邏輯，並特別強調「表演」——具體而言是「視覺化」的抗爭劇目「表演」——作為模式化的共同腳本而成為重要的抗爭劇目（劉濤，2016a，2016b）。

因此，「視覺」是中國「抗爭表演」的重要主線。抗爭者在「國家中心」機會結構下，通過特定的視覺化手段，將自身的利益訴求公開化、焦點化、政治化，從而觸動公共情緒形成輿論壓力，最終得以進入政府政策議程（黃振輝，2011）。相應地，權力集團所忌憚的也不是抗爭表演本身，而是抗爭表演的視覺化（劉濤，2016a，2016b）。某種程度上，既有的中國抗爭表演研究已經捕捉到了非常在地化的視覺表演特徵，相關研究也方興未艾，對傳統「抗爭表演」研究進行成功的在地化運用、延伸和提煉（王蒙，2013；郭小安、劉明瑤，2016；黃振輝，2011）。但既有研究更多的是關注直觀的圖像化、媒介化問題，而對視覺表徵背後更具體的身體和空間等要素缺乏應有的關注（劉濤，2016a，2016b）。而實際上，任何抗爭表演都必然是一個複雜的身體化和空間化實踐過程，比如上述下跪、喝農藥、跳樓、跳橋、自焚等抗爭表演劇目都離不開特定空間下的特定身體實踐。換言之，所謂的圖像化和媒介化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爭取特定的身體表演在特定的空間被看見的過程；身體和空間實踐是視覺表徵的圖像和媒介的基礎。

實際上，抗爭表演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為了「爭取被看見」（struggle to be seen）（Guidry, 2003）。因此，抗爭表演的「視覺」不僅包括中國學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9期(2019)

者特別關注的「可視」問題，即圖像與媒介的問題，還同時包括「可見」問題，即圖像化什麼、媒介化什麼，以及什麼可見，什麼不可見的問題 (Rovisco & Veneti, 2017)。特別是在中國特定的「國家中心」政治機會結構下，「可見」問題甚至比「可視」問題更重要，或者說「可視」根源上是為了「可見」，因為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往往「要限制、杜絕群體抗議的能見度」(劉世鼎、史唯，2017：21)，使其排除在其他民眾的視覺範圍之外，以限制廣大民眾觀看和知悉社會抗爭並防止可能的連帶問題。在這種政治運作之下，抗爭者需要把圖像、媒體、身體、空間等不同要素有機會結合起來，才可能在既有政治機會結構內打開真正的視覺空間：「首先，身體提供給這個視覺空間源源不絕的原材料。這個視覺空間是由一系列戲劇性的、創意的、大膽的身體抗爭，驚人的場景畫面，再經由媒體傳播出去所構成的底層政治領域。這個另類的視覺空間，在嚴密的官方封鎖下，構成了另類能見度和理解框架，讓人民獲得更多能動性，從而有利於他們爭取被觀看的權利」(劉世鼎、史唯，2017：4)。

因此，本研究希望在抗爭政治的「抗爭表演」理論脈絡之下，強調中國「國家中心」政治機會結構的特殊意義，在中國既有的「表演式抗爭」「視覺抗爭」「情感抗爭」「身體抗爭」等在地化「抗爭表演」研究譜系之下(王蒙，2013；郭小安、劉明瑤，2016；黃振輝，2011；劉濤，2016a，2016b，2017)，聚焦中國抗爭表演的「視覺」主線，嘗試把既有研究不同個案中的不同要素——圖像、媒體、身體、空間等——有機會結合起來，並梳理不同要素之間的相互關係，最終形成一個操作化的、系統性的視覺分析框架。

抗爭表演的視覺框架

傳統抗爭研究強調社會運動及社會抗爭的理性和策略面向 (McAdam, 1982; Tilly, 2000, 2008)，因此，相應地強調理性的文字和語言陳述如演講、聲明、宣言等而非感性的視覺圖像 (Benford & Snow, 2000; Morrison & Isaac, 2012)。但是，越來越多的學者強調要重新關注「抗爭的情感」(emotions of protest) 這一社會運動命題 (Flam, 2005;

抗爭表演的視覺框架：中國網絡名人的實踐經驗

Goodwin & Jasper, 2006; Jasper, 1998, 2006)，與情感表達緊密相關的視覺圖像開始越來越受到重視(Adams, 2002; Halfmann & Young, 2010; Isaac, 2008)。而且隨著以新型的社會問題和身份認同為基礎的新社會運動理論的興起和發展(Cohen, 1985; Melucci, 1989)，與認同表達緊密相關的視覺圖像進一步受到重視。研究者開始關注抗爭者如何運用視覺性的圖像、符號、海報、視頻等「表達目標和認同，動員新的參與者，吸引和形塑媒體報道，以贏得更廣泛公眾的支持」(Rovisco & Veneti, 2017, p. 273)。

這時，視覺，特別是圖像和媒介，已經與抗爭內在地聯繫起來，並被放置於抗爭最核心的位置，甚至出現了抗爭研究領域「視覺轉向」(visual turn)的說法(Philipps, 2012, p. 3)。比如Nicole Doerr等人(2013, p. xi)認為「社會運動已經內在地依賴於視覺。社運積極分子需要接合視覺信息，使他們的活動通過圖片及視頻再現出來，這決定了他們在公共領域可見或者不可見」。Lina Khatib(2012, p. 1)也認為社會抗爭「本質上成為一個視覺生產過程」，因為抗爭某種程度上成為對「出現與可見的爭奪」。不過，這時候的視覺研究主要集中於圖像研究，沒有形成較為系統的視覺分析框架。2010年以來，「阿拉伯之春」、「佔領運動」、「太陽花運動」、「雨傘運動」等一系列社會運動和社會抗爭席捲全球，視覺在運動的爆發、擴散、延續等環節都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和重視(Lee, 2015; Mattoni & Teune, 2014; Morrison & Isaac, 2012)。但這時候的抗爭視覺研究除了關注原來的圖像及媒體(特別是社交媒體)問題(Howard & Hussain, 2011; Khatib, 2012; Khondker, 2011)，也開始重視圖像及媒體背後的身體及空間問題(Butler, 2011; Juris, 2012; Mitchell, 2012)。這些研究為我們確定抗爭表演視覺框架的各種要素及其相互關係提供重要的參考作用。

要素一，圖像。既有抗爭表演視覺研究主要從視覺文化研究汲取理論源泉，從「可視」面向強調圖像在視覺時代承擔社會爭議戲劇性、形象化、奇觀式生產與表徵的作用(Blair, 2004)，以及在此基礎上生產觀念、擺出理由、塑造輿論的過程，因此將抗爭表演接合為經由圖像引擎、驅動並主導的「圖像事件」(image event)(Delicath & Deluca, 2003, pp. 320-321)。但是，新近的全球社會抗爭研究更突顯視覺政治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9期(2019)

研究，從「可見」面向強調阿拉伯地區威權國家如何控制視覺的生產與消費，而民眾如何將視覺轉換成為一種抵抗工具，一種「革命性的基礎設施」(Khatib, 2012, p. 135)。在此基礎上，民眾將抗爭變成一個「圖像爭鬥、逆轉、抹除、替換其他圖像的連續過程」(p. 1)，從而從權力當局的嚴密視覺控制中重奪自己的視覺權利，並將抗爭者從「被動的視覺圖像客體轉變為被賦權的主體」(p. 129)，最終建構一種基於「可見」的「新政治」(p. 128)。這種爭奪「可見」的視覺政治對既有的基於「可視」的視覺文化研究非常重要，因為如上文所述，「可見」在「國家中心」政治機會結構下對抗爭表演尤其重要(劉世鼎、史唯，2017)。因此，圖像，特別是爭奪性的圖像，將是本研究視覺框架的第一要素。

要素二，媒體。傳統抗爭研究認為媒體傾向於邊緣化社會抗爭，並形成特定的抗爭報道範式，突顯抗爭的負面的、暴力的和非理性因素，因為媒體傾向於將政府當局視作權威信息來源(Dardis, 2006; Stamou, 2001)。而新近抗爭視覺研究認為，抗爭者越來越擅於給媒體製造並提供各種視覺圖像，並藉由媒體爭取公眾對抗爭的理解和共情(Corrigall-Brown, 2012; Liao, 2010)。特別是隨著社交媒體深度介入新興的全球抗爭浪潮，視覺圖像藉由社交媒體的去中心化傳播而形成的動員和傳播力量已經被充分展現出來(Kharroub & Bas, 2016; Tang, 2015)。而在中國特定的政治機會結構下，大眾媒體以及互聯網等新媒體都是抗爭表演的重要資源，甚至是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抗爭資源，不僅能夠保障並提升抗爭的能見度，還能對抗爭目標或者地方政府進行一定程度的施壓(曾繁旭、黃廣生，2013；楊國斌，2009)。有研究者甚至因此認為只有媒介化的圖像才是真正有動員力量的視覺力量，因此中國抗爭表演的實質因素是「媒介動員」(呂德文，2012)。

要素三，身體。過於突顯圖像和媒體甚至化約抗爭表演和圖像事件、媒體事件之間的關係，會陷入忽視抗爭者主體的問題，因此要從行動者，特別是行動者身體的角度來理解抗爭表演。比如，Jeffrey Juris (2012) 批評傳統的圖像事件、媒體事件很多都是「去身體化的」，但是，實際上圖像需要透過身體化的表演才能與抗爭情感聯結。換言之，抗爭表演中，圖像和媒體等都是與抗爭行動者特別是行動者身體內在聯結的，本質上都是「身體化的抗爭」(embodying/embodyed

抗爭表演的視覺框架：中國網絡名人的實踐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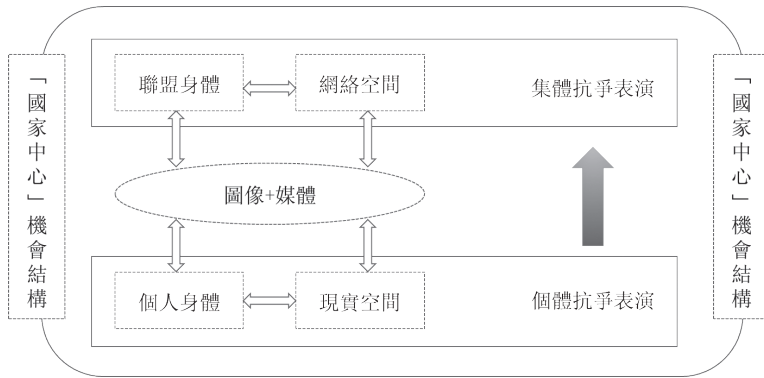
protest) (Juris, 2012; Tapias, 2015)；當然，身體也要進入視覺範疇才能產生抗爭政治的效果 (Butler, 2011)。Judith Butler (2011) 更是強調這種身體化的抗爭不是行動者孤立的身體，而是「聯盟身體」(bodies in alliance)，是聯結的身體而非任何口頭或者書面的方式發出正義的訴求，才能召喚出集體的政治能動性在既有政治控制中創造出「顯現的空間」(the space of appearance) (Arendt, 1959)。特別是在中國特定的政治機會結構下，抗爭者更需要用身體為抗爭視覺提供原材料 (呂德文，2012；劉世鼎、史唯，2017)，而且往往是「一個個痛苦的身體、喪失尊嚴的身體、毫無倫理顏面的身體，使身體從原始的自然狀態、黑暗狀態、反社會狀態中掙脫出來，成為抗爭性話語生產的政治文本和表達媒介」(劉濤，2017：62)。

要素四，空間。正如圖像與媒介緊密相關，身體則與空間緊密相關，因為身體要進入抗爭場域，需要特定的公共空間實踐，使身體不再屬於私人而變成公共的身體 (Butler, 2006)。新近的全球社會抗爭研究一方面是突顯身體在具體公共空間如廣場、公園、街道等公共空間的聚集 (Butler, 2011)，乃至在全球空間的聯動 (Mitchell, 2012)，另一方面則是突顯網絡空間在在地抗爭和全球抗爭中的動員作用 (Gaby & Caren, 2012; Lin, 2017)，以及網絡空間與現實空間的視覺「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Garrett, 2014)。這兩方面對中國抗爭表演也尤為重要，因為上述的種種身體表演實際上需要非常特定的具體的空間實踐，比如，短短一個多月時間內連續上演12跳的獵德橋 (黃振輝，2011)、釘子戶樓頂自焚 (呂德文，2012)、在政府門前下跪 (劉世鼎、史唯，2017) 等；同時也需要與全球空間和網絡空間聯動，形成「表演在線下，抗爭在線上」(劉濤，2016a：14) 的特定聯動模式。

最後，傳統抗爭政治研究更多強調抗爭的「集體」面向而忽視「個體」面向 (McAdam, Tarrow, & Tilly, 2001; Tilly & Tarrow, 2006)。這種集體視角關注到了社會抗爭的規模效應，而上述圖像、媒體、身體、空間等要素的系統作用，特別是從個體身體到聯結身體，現實空間到網絡空間的聯動，則指向了一個個體抗爭向集體抗爭演化的可能路徑，指向一個新的可能的視覺分析框架 (圖一)。接下來，本研究將繼續通過相應的案例研究具體解釋，在互聯網時代中國政治機會結構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9期(2019)

圖一 抗爭表演的視覺框架



下，抗爭表演具體的視覺實踐邏輯是什麼？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係是什麼？這一視覺框架又有何理論內涵和現實意義？

研究方法

在視覺視角下，本研究將特別關注中國網絡名人的視覺抗爭表演實踐。相應的，基本研究設計則是案例研究。案例研究可以通過對單一實踐案例的研究凝聚理論與經驗，進而形成「一個具體的、獨特的、有界的系統」(Stake, 2000, p. 436)。因此，儘管是單一的案例，卻也可能是完備的系統，對某一現象和問題提供「豐富而全面的詮釋」(Merriam, 1998, p. 41)。這種豐富而全面的案例詮釋特別適合於探索式的研究問題，特別是在闡釋意義上有其獨特的優勢(Yin, 2003)。因此，本研究採用案例研究作為基本的研究設計以期探索中國政治機會結構下抗爭表演的視覺實踐邏輯。

在具體的案例選擇上，本研究聚焦一位代表性網絡名人葉海燕。2005年葉海燕一夜成名，因為她在天涯社區發佈了自己的半身和全身裸照，引來網友的爭相圍觀，天涯服務器甚至一度因為訪問量激增而癱瘓。成名之後，葉海燕在網絡上一直保持活躍，有持續的活躍度和知名度，但更多的是以女權工作者的身份積極介入一系列公共事件，進行其富有個人風格的抗爭表演。其中包括兩次有國內及國際影響的抗爭表演，一是2012年的「免費提供性服務」事件，二是2013年的「校長，開房找我」事件。

抗爭表演的視覺框架：中國網絡名人的實踐經驗

「免費提供性服務」事件發生於2012年4月廣西博白縣。2011年8月葉海燕在廣西博白成立了「浮萍健康服務工作室」，繼續其預防艾滋病宣傳工作以及對性工作者的健康服務。工作室一街之隔的鋪面有幾十家髮廊、按摩店、小旅館，這些鋪面被當地人稱作「十元店」，因為裡面住著一群四十歲左右的性工作者，每次收費僅十元甚至五元。葉海燕主要的工作便是向她們發送防艾知識宣傳單、衛生濕巾、安全套、HIV試紙等。不過，為了更好地進行調研，葉海燕最終決定臥底「十元店」，通過自己的「田野調查」收集數據。在葉海燕臥底的第二天，其熟悉的一個「姐妹」被警察「掃黃」拘留罰款，葉海燕認為這是警界腐敗，「合法搶劫」，即警察把這些「十元店」性工作者當作提款機，對她們進行輪流罰款。葉海燕憤怒地發了一個微博消息：「我從現在開始，對來這裡的農民工提供免費的性服務，一是以他們被警察抓，處以高額經濟處罰，被合法搶劫。二是為解決基層百姓的性需求，緩解社會壓力做出努力。三是用我的高風亮節對比政府的麻木無情，希望對他們有所觸動。活動明天結束。」自此，一個私密的臥底調查變成了公開的抗爭表演。

「校長，開房找我」事件發生於2013年5月海南萬寧市。5月8日，海南省萬寧市後朗小學六名就讀六年級的小學女生集體失蹤，後來發現是被萬寧市第二小學校長陳在鵬及萬寧市房管局職員馮小松帶走開房，而經到醫院檢查，六名女生下體遭到不同程度傷害，疑似遭遇性侵。事件被媒體曝光後引起輿論強烈關注，特別是社會各界對保護未成年人的擔憂。5月27日「六一兒童節」前夕，葉海燕從廣西博白趕赴海南萬寧，到萬寧教育局及萬寧第二小學門口舉牌抗議，於是才有了那張一下子火爆中國網絡的舉牌照片「校長，開房找我，放過小學生！」。這照片一下子在網絡上掀起效仿熱潮，不少網民紛紛舉牌要校長來找他們「開房」，並拍照上傳網絡，最終個體的抗爭表演成為一個重大的網絡事件。

在具體的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主要採用虛擬民族誌式的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民族誌在收集一手數據上有其獨特的優勢，但往往無法穿透現實時空局限洞察田野背後的動機、故事、經歷、情感等，特別是虛擬民族誌面對的是網絡虛擬空間這個相對更加碎片化、非連續性的「貧瘠」田野而非「肥沃」的真人實時交流田野，因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9期(2019)

此，很多學者強調深度訪談對虛擬民族誌研究的重要補充作用，甚至嘗試把訪談放置於虛擬民族誌的中心位置(Miller & Sinanan, 2014; Skinner, 2012)。虛擬民族誌式觀察從2011年延續到2017年，關注葉海燕相關的一切公共動態和活動，也包括其所有的社交媒體平台如Twitter、微博、微信公眾號等。深度訪談集中在2014年8月11日至8月12日，筆者到葉海燕武漢老家進行了為期兩天總共十個小時左右的訪談，訪談地點在其工作室，訪談對象不僅包括葉海燕，還包括其部分家人，不過出於其家人隱私保護，文中不出現其相應信息。

資料分析或研究發現

抗爭表演的圖像化和媒介化

葉海燕的抗爭表演實踐都是在互聯網情境下的社會抗爭個案，互聯網對其參與、劇目、組織確實都產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但是，由於中國特殊的政治機會結構，互聯網包括社交媒體最終也受到國家的嚴密管制(夏倩芳、袁光鋒、陳科，2012)，以至於葉海燕還發文呼籲「請不要使用Sina的產品(微博)，他們是政府的狗，他們扼殺性工作者的聲音」。因此，與全球抗爭運動「誕生於網絡，擴散於網絡，維持於網絡」(Castells, 2012, p. 168)不同，葉海燕因應中國特殊的政治機會結構，對互聯網採取更加實用主義甚至是「用完即棄」的態度，其有意識考量的、或者潛意識因應的，更多的是互聯網情境背後更重要的因素即中國特定的政治機會結構。

實際上，中國「國家中心」的政治機會結構可能是一種刻板化、模型化的想象。這一政治機會結構並非鐵板一塊，網絡名人作為這個宏大結構裡面無法被完全收編的異質性存在，總能在既有體制結構中找到其表演的空間和機會。因此，即使葉海燕有其堅守的抗爭陣地(女性權益、女權主義等)，但卻不與國家展開陣地戰，而是堅持游擊戰，在國家宏大政治機會結構之下，處於警惕且靈活的機動狀態，把握微小的、稍縱即逝的熱點事件和機會窗口，隨時出擊。這種把握熱點事件進行抗爭表演的「套路」，某種程度上是在大的政治機會結構下，創造

抗爭表演的視覺框架：中國網絡名人的實踐經驗

了新的「事件機會結構」(issue opportunity structure) (Yang, 2016)。葉海燕往往只就事件進行抗爭表演，擴大影響力而不擴大議題，因此不會直接指向敏感的國家體制問題，更能展現表演的靈活性以及其與國家的動態關係。

在這種特殊的「事件機會結構」之下，葉海燕發展出了其特定的表演在線下抗爭在線上的抗爭表演模式，而聯結線上線下的中介環節便是對表演抗爭至關重要的圖像化和媒介化。因此，葉海燕抗爭表演的目的並非直接的利益訴求表達，而是為了製造圖像，特別是可以在互聯網場域中傳播的圖像符號；換言之，其抗爭表演更多的是為了通過圖像製造有社會爭議建構能力的「圖像事件」(Delicath & Deluca, 2003)。葉海燕在訪談中談到，她已經逐漸發展出了自己的抗爭風格和套路，即最重要的就是對抗爭的圖像化，線下的表演都是服務於線上的圖像的：「一定要把現場的表演行動跟網絡上的輿論情緒結合起來，一個行動才能夠被更廣泛地宣傳，被更多人了解」(葉海燕)。相應的，抗爭對象所忌憚的並不是葉海燕「免費提供性服務」的表演，而是其表演被圖像化並在網絡上被直播了；也不是葉海燕在校門口舉牌「校長，開房找我，放過小學生！」，而是其表演被專人拍下並上傳到網絡被網民圍觀、闡釋並模仿了。

這種抗爭表演圖像化的內在邏輯是，視覺圖像往往刺激、逼真而又鮮活，能幫助人們更輕易地獲取意義，同時也在圖像與受眾的心理和情感互動過程中充當意義生產者而展現出其強大的勸服力量。但是，在葉海燕的實際案例中，圖像事件的這種引擎機制並不完全是如前人所言，是因為這種奇觀化圖像能夠喚起公眾情緒，或者是因為圖像具有特殊的政治安全特質能巧妙地避開國家的審查機制(劉濤，2016a)。更實際的是，葉海燕的抗爭經驗已經證明這種圖像化機制的有效性，因此她更積極、策略、能動地運用這一套路，甚至某種程度上已經形成了一定的路徑依賴。而且，葉海燕拒絕傳統表演抗爭所採用的低姿態的、消極的、被動的、無奈的、卑微的、甚至乞求性的表演圖像，而更傾向高姿態的、積極的、主動的、創意的、高亢的、甚至進攻性的視覺圖像，比如「開房找我」之類的圖像；並不僅僅是通過呈現苦難奇觀來營造「悲情」，而更傾向於製造戲劇奇觀來進行「戲謔」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9期(2019)

(楊國斌, 2009)。但是, 這種圖像實際有其局限性, 因為戲劇性和奇觀式圖像的「吸睛效應」是一把雙刃劍, 在吸引公眾注意力聚焦事件的同時, 也容易使注意力偏移到滿足視覺表演本身而非其背後真正的社會事件本源。這也成為其抗爭表演之後新華社、《人民日報》等官方媒體批評的著力點, 即這種表演更多的是消解了事件本身的嚴肅性而使事件娛樂化, 甚至有個人「炒作」的傾向。

而且, 這種圖像實際嚴重依賴於媒體, 只能經由媒體報道得到公眾關注, 才可能真正爭取到抗爭的能見度並使其成為抗爭目標或者政府的實質性壓力(劉世鼎、史唯, 2017)。在這個意義上, 抗爭表演的圖像化是沒有獨立性的, 圖像化與媒介化是緊密相關的; 換言之, 圖像事件是遠遠不夠的, 實質還需要從圖像事件轉化為媒體事件。對此, 葉海燕非常自得且已深諳此道, 有其更實用主義的策略和路徑。首先是利用互聯網社交媒體, 主要是微博等, 對圖像化的抗爭表演進行實時的、大範圍的媒介化傳播, 在網絡上形成影響力後, 再吸引傳統大眾媒體的跟進報道, 同時也主動地尋求國際媒體的報道和傳播, 以便在國內傳播機會閉合時有替代性的國際媒體資源接力避免被完全消聲。比如「免費提供性服務」的表演就在新浪微博、騰訊微博上進行了為期兩天半的直播, 先在互聯網上造成巨大的影響, 而當社交媒體開始受到限制封殺時, 事件影響力已經吸引到了《南方周末》、鳳凰衛視等大眾媒體的跟進報道。

但是, 在中國情境下, 境內媒體一方面是成為社會抗爭的重要傳播渠道, 另一方面卻又受制於制度力量等因素, 國家對媒體的干預和支配力量依然強大, 過分依賴國內媒體資源往往使抗爭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夏倩芳等, 2012)。因此, 葉海燕直播時就一直在微博上發文積極尋求境外媒體的介入: 「我需要大家幫我翻譯英文, 我要尋求國際團體的支持」「請熟悉英文的朋友, 幫我將這些微博翻譯成英文, 將我的訴求發給海外的一些媒體, 女權組織」。在全球化語境下, 特別是在互聯網情境下, 國際媒體已經成為社會抗爭多層次抗爭的重要資源。事實證明葉海燕這種策略是有效的, 《蘋果日報》、《南華早報》、BBC、VOA等很快也紛紛抵達廣西博白或通過聯線的方式對事件進行報道, 提升了其抗爭表演的國際能見度並吸引國際輿論的關注。但是, 如同

抗爭表演的視覺框架：中國網絡名人的實踐經驗

圖像化有其局限一樣，媒體化也有其局限甚至是不良影響，特別是10月29日《廣州日報》大洋網的報道〈縣城裡的女志願者葉海燕：我想給他們帶來溫暖〉被搜狐等網絡媒體以〈葉海燕：拿什麼拯救你，小城裡的性工作者〉為題轉載之後，未加隱私處理的圖片實際上曝光了照片中的性工作者，對當事人造成了巨大傷害，葉海燕最終只能倉皇逃離。

總體而言，儘管各有其局限，圖像和媒體還是被葉海燕充分地運用於其抗爭表演之中，成為其挑戰性和實踐性的抗爭路徑，某種程度上也成為其替被剝奪了話語資格的底層階層、邊緣群體爭取「可視」和「可見」的視覺路徑，並在此基礎上得以進一步構建社會爭議、爭奪公共話語、生產傳播空間。不過，理解這種視覺邏輯不能停留於圖像與媒體本身，應該回到更具體的身體和空間層面，在抗爭表演領域裡通過身體轉向和空間轉向來更深入地理解這種抗爭表演。

抗爭表演的身體化和空間化

其實，Lise Nelson (1999) 早就對相應的「表演理論」提出過批評而強調「身體（與空間）至關重要」，認為「表演」需要身體、空間提供具體行動、協商和反思的場域；相應地，到了抗爭政治領域，抗爭不僅涉及圖像和媒體，也必然涉及身體和空間。對於葉海燕而言，身體更是完全內在於其抗爭實踐的，或者說抗爭是內在於其身體實踐的。葉海燕成為網絡名人便源於其「裸照事件」，而裸照一開始就是一種直接的挑戰和抗爭：「我覺得我展示自己裸體的動機不是為了自己，我倒覺得我就是一種挑戰，對你的一種挑釁。你認為不應該怎麼樣，我就是要這樣，你又能怎麼樣？就是這種態度，就是一種挑戰的態度」（葉海燕）。因此，葉海燕特殊的成名經歷使其身體與抗爭內在地結合在一起；身體化成為其後續幾乎所有抗爭實踐的「源代碼」。

身體展演的成名之路不僅讓葉海燕見識到了「身體的力量」，更讓其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了自己的抗爭路徑：「這是身體的力量。我覺得這是很獨特的一種表達和抗爭方式。我也經常使用這種方式，很輕易地我就會想到這種方式。這種方式越來越功利性。得到關注的眼光，是很重要的。我知道這一點，所以後面就增加了很多小聰明在裡面，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9期(2019)

就是可能功利性就越來越強了。這個姿態是故意呈現出來的，當然我也有把我的憤怒，融入在這裡面的，可是我有更多目的性。所以它就是，先慢慢的成為一種自我的行為，然後變成一種自我的抗爭行為，最後就變成一種社會行為，就是再也不是屬於純粹的、個人的一種行為了」(葉海燕)。

其實，從葉海燕成名的「裸照事件」開始，她的身體表演就不再是自然的、私密的身體，而是藉由視覺把身體推向了公共空間和社會場域對身體進行社會化表徵，成為整個社會系統都要一起面對的身體問題。這時候，葉海燕的身體化抗爭不僅僅是進入了公共空間和社會場域，更是完成了身體作為生理的肉體到作為政治行動者的話語場域的轉變。換言之，葉海燕的身體表演不僅僅發生於一個純粹的生理場所，還作為意義載體介入社會秩序、道德領域和政治場域，它在微觀層面揭示社會秩序的失衡，傳遞弱者的絕望以激發道德領域的情感支持，並以此喚起權力階層的道義反思。比如，「免費提供性服務」事件中提供最低廉性服務卻又遭受「合法搶劫」的性工作者，「開房找我」中遭受性侵卻又被禁聲的小學生等等。

特別是「裸照事件」之後，當葉海燕接觸到女權主義並開始標榜自己的女權主義者身份之後，這種身體作為抗爭力量的意義更為重要，因為這正是女權主義研究一再強調的(Duncan, 1996)。因此，葉海燕的每一次抗爭表演都離不開這種女性身體的反抗力量，如中山大學前教授艾曉明評價葉海燕抗爭表演時所說的：「女性的身體太多的被定義為一個慾望的對象，一個承載的身體，但是太少的被看作是可以反抗的身體，有力量的身體，所以我覺得這個身體的表達是需要傳達出不同的意義來，就是我可以有力量，我可以反抗，而且我有反抗的能力，我覺得這個信號需要非常清楚的表達出來……所以我覺得她的弱項正是一個反抗的資源，從某種程度來講，也正是一個優越之處」(艾曉明，2013)。

因此，葉海燕這種身體抗爭模式，並不僅僅是如西方女權主義研究那樣突顯女性身體力量，也是在中國語境下，把女性身體發展成為重要的抗爭資源和武器：「我覺得對女性來說，這個(身體)可能是最有力量的，也是最容易拿出來的一種武器，比如說很多行為藝術也是借

抗爭表演的視覺框架：中國網絡名人的實踐經驗

身體來展示的。我知道身體本身是具有很大的力量，那我利用這個來做一些抗爭。脆弱的人群其實更容易利用這一點」（葉海燕）。弱者身份，特別是女性作為天然的弱者，在中國語境下具有強大的社會力量，蘊含著道德潛力，暗含著反抗不平等和伸張正義的意味，能夠享受制度性或政策性庇護（董海軍，2008）。不同於James Scott (1987)所研究的東南亞底層農民日常抵抗中所運用的「弱者的武器」，在中國弱者身份本身就能成為一種武器。因此，葉海燕在每次抗爭表演中，幾乎都潛意識地轉向其女性身體，將其資源化、武器化。

這種抗爭表演的身體展演、身體力量、身體資源和身體武器，除了與上節所述的圖像化媒介化緊密相關，即戲劇性的、創意的、大膽的身體為圖像和媒體提供源源不斷的原材料，往往還需要一定的空間實踐。因此，葉海燕在每次抗爭表演的時候，都自我要求身到現場，把身體作為抗爭的首要場域：「這種社會運動，必須要身到現場才會更有影響力。如果自己在自己家裡，沒有用的。到事故發生的現場去做這些事情，才有意義」（葉海燕）。這種「身到現場」不僅僅是上述圖像化媒介化創造圖像事件和媒體事件的內在要求，實際上，這也是Butler (2011)強調的通過具體的身體在場將一個抗爭空間轉變為一個公共空間的內在要求。

某種意義上，葉海燕的身體化抗爭不僅僅是將自然的身體變成社會的身體，使身體借由圖像化媒介化的表演進入公共空間，甚至是在身體層面就已經創造了公共空間。換言之，身體不僅僅只是空間的一部分，身體本身就是空間性的，並且也有能力生產新的空間。Henri Lefebvre (1974, p. 173)就曾指出「整個空間都從身體開始」。因此，葉海燕每次抗爭表演都幾乎潛意識地將其身體轉變為抗爭的空間，特別是表達和書寫的空間，但這只是一個開端，它實際指向更加遙遠的秩序，也影響更多人的抗爭模式，繼而開關一個身體抗爭的共同空間。比如，在「校長，開房找我」事件之後，廣大網民就紛紛效仿葉海燕，生產具體的身體表達空間，艾未未和艾曉明等更直接把葉海燕的標誌話語書寫在胸部和腹部，「我覺得身體就是一張紙嘛，我覺得抗議的話，寫在這張紙上也非常合適」（艾曉明，2013）。這時候，身體空間實際成為了具體的抗爭「行動場域」(sphere of activity)，使抗爭者能通過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9期(2019)

身體層面的微觀空間表演其不服從而讓觀眾看到自己 (Rancière, 2004, p. 40)。

除了具體的廣場、步行街、身體等現實空間，葉海燕的身體化抗爭經過圖像化和媒介化之後，實際還聯結了網絡虛擬空間。比如，「免費提供性服務」的圖片不僅充分展示了「十元店」的惡劣環境，也利用圖像特有的豐富性、浮動性和不確定性給廣大網民的事件圍觀和圖像詮釋提供了充分的參與空間。而「校長，開房找我」事件之後，葉海燕舉牌「校長，開房找我」的照片更是一下子火爆網絡，在一周之內，在百度、谷歌和新浪微博上便分別有730萬、278萬以及70萬的搜索結果。新浪微博還有「#開房找我#」的熱門標籤和話題主頁，而且主頁迅速聚集了14.6萬的粉絲以及超過1萬的發貼，主要都是模仿葉海燕的舉牌行為，以各種千奇百怪的方式舉牌「校長，開房找我，放過小學生！」，迅速成為網絡空間一種集體抗爭的「互聯網模因」(internet meme) (Nissenbaum & Shifman, 2015)。

但是，當廣大網民都在網絡空間模仿和跟隨葉海燕進行這種身體化抗爭表演的時候，就不僅僅只是符號化的「互聯網迷因」，更是具體的、集體的身體實踐，繼而生產某種新的公共空間。儘管這種網絡集體身體實踐的協同性不是特別強，但由於它們共享同一個「模因」，其實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聯盟的身體」，網絡虛擬空間也被他們這種共同的身體實踐相應地宣稱為特定的公共空間：「身體聚集在一起，他們一起前進和發言，他們宣稱某個空間是公共空間」(Butler, 2011)。而在這一過程中，最重要的便是身體的聯結與聯盟，以及在此基礎上的表演實踐，即行動者通過戲劇性的自我建構，向當局者提出他們的訴求，並力圖從現有的國家系統中爭奪自己的合法性。在葉海燕的案例中，網民則是通過各自戲劇性的表演，向校長提出「開房找我」的訴求而非直接嚮當局者提出訴求，但每個個體的獨立身體實踐在這一統一訴求下結成了聯盟，才反過來無聲地、曲折地嚮當局者提出他們的訴求或者說是控訴，甚至是質疑抗爭對象的合法性而非直接爭奪抗爭者自己的合法性。在Butler (2011) 看來，這種「聯盟的身體」所爭取到的公共空間甚至是一種「顯現的空間」，因為這種公共空間實際出現並存在於自我與他人的聯盟的身體「之間」(between)：「我為他人顯現而他

抗爭表演的視覺框架：中國網絡名人的實踐經驗

人也為我顯現」(Arendt, 1959, p. 178)。在葉海燕的實踐案例中，其自我的身體與他人的身體確實是互相顯現的：她的身體顯現是為他人——性工作者、被侵害的小學生、弱勢的婦女兒童等——他人的身體顯現則是為了支持她或者營救她，比如艾未未、艾曉明等的身體展演、廣大網民的模仿戲謔，以及後續律師團的奔赴支援、網民的「明信片行動」解救葉海燕等等。

在這種「顯現的空間」的視角關照之下，抗爭表演的身體化和空間化如同上節討論的圖像化與媒介化一樣，其實是互相交織在一起的，具有了內在的統一性，甚至是一個基礎性的同構過程。這種同構過程和雙向模式對我們理解抗爭表演尤為重要，它提醒我們穿透圖像和媒體去考察和反思至關重要的身體與空間對抗爭表演的基礎性意義，以及它們之間的內在關係。

結論與建議

本文試圖從「視覺」視角介入抗爭表演研究，以中國網絡名人葉海燕的抗爭實踐經驗為案例，探索中國「國家中心」政治機會結構下抗爭表演的視覺分析框架，並從圖像、媒介、身體和空間四個具體面向考察抗爭表演內在的視覺實踐邏輯。而在結論部分我們將從抗爭表演的視覺「可視」和「可見」層面，進一步指向抗爭的視覺「可現」(vision) (Mattoni & Teune, 2014)，思考抗爭表演的視覺框架將為互聯網時代的抗爭政治及中國政治提供何種可能的想象。

對抗爭政治而言，首先，「國家中心」機會結構下的抗爭表演視覺框架將在中國既有的抗爭模式和策略的基礎上，打開一個更宏大的行動框架和機制，一個同時包含個人與國家、線下與線上、個體與集體、在地與全球的抗爭場域；其次，充分接合圖像、媒介、身體和空間的視覺框架可以為傳統的「媒體—社會運動」二元框架提供一個更多元的關係圖景而非兩極的線性關係；最後，充分考慮個人身體與聯盟身體之間聯動的視覺框架，能為傳統強調「集體」與「規模」的抗爭政治提供一個可能的「從個體抗爭到集體抗爭」的社運新模式，這對中國當前碎片化社會下的個體抗爭表演有特殊的意義。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9期(2019)

對中國政治而言，抗爭表演的視覺框架在宏觀結構下，突顯出抗爭行動者本身的能動性，甚至可能對上述「塑造」抗爭政治的國家在不同政治層次進行一定程度的「反塑造」。首先，在政治背景層次，可能對政府政策執行能力的強與弱，政治支持的多與少，甚至政體的開放與封閉依次產生漸進的影響；其次，在政治環境層次，可能影響國家抗爭治理策略的吸納與排斥、包容與鎮壓，乃至國家權力社會滲透的強與弱；最後，在政治結構層次，可能對政治制度的權威韌性、機會結構和政治資源，乃至對國家結構的機構壟斷、組織壓制和信息控制都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但是，我們也不能對抗爭表演視覺框架的潛力抱有過於樂觀的期望和幻想，而要對其內在的局限保持敏銳的察覺。在微觀層面，這一視覺框架受到了抗爭表演者媒介素養和資源以及抗爭經驗和策略的限制。葉海燕作為女性網絡名人以及社會活動家在這兩方面都有優勢，而其他底層弱勢者可能難以有效地、充分地運用這一視覺框架。在宏觀層面，「國家中心」機會結構仍有非常強大的制度性約束，特別是容易借其對媒體的有力控制突破視覺框架中最薄弱的「媒體」環節導致整個框架的潰散。而且，「國家中心」機會結構本身也處於不斷演化的過程中，給視覺框架的動態適應也提出了挑戰。

除了上述現實的實踐意義，本研究也希望在理論意義上有所貢獻。其一，傳統抗爭政治研究大致經歷了從宏觀理論擴展到微觀機制的研究路徑，本研究則強調要兼顧宏觀結構與微觀機制，特別是關注宏觀結構下個體抗爭向集體抗爭演化的可能路徑。其二，中國抗爭政治研究已經捕捉並提煉出一系列非常在地化的解釋性概念，本研究則進一步嘗試有機結合這些關鍵概念和關鍵要素形成一個更系統性的分析框架。其三，本研究期望這一分析框架對理解世界其他地區特別是政治體制具有一定相似性的國家和地區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當然，不管是對內的解釋力還是對外的啟發性，都需要建立在未來更多更深入的經驗研究基礎之上，而且不僅需要中國內部更多更細緻的案例研究，也需要更多跨地區、跨國別的比較研究。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于建嵘 (2008)。〈農民維權與底層政治〉。《東南學術》，第3期，頁12-15。
- Yu Jianrong (2008). Nongmin weiquan yu diceng zhengzhi. *Dongnan xueshu*, 3, 12-15.
- 王蒙 (2013)。〈當代中國政治中的表演式抗爭：景觀、結構與效能〉。《西南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第5期，頁23-31。
- Wang Meng (2013). Dangdai zhongguo zhengzhizhong de biao'yanshi kangzheng: Jingguan, jiegou yu xiaoneng. *Xinan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ban)*, 5, 23-31.
- 朱健剛 (2011)。〈以理抗爭：都市集體行動的策略〉。《社會》，第3期，頁24-41。
- Zhu Jianguang (2011). Yili kangzheng: Dushi jiti xingdong de celve. *Shehui*, 3, 24-41.
- 艾曉明 (2013)。〈專訪艾曉明：裸露就是反抗〉。《網易女人》。取自<http://lady.163.com/special/sense/2013renwu05.html>。
- Ai Xiaoming (2013). Zhuanfang Ai Xiaoming: Luolou jiushi fankang. *Wangyi Nuren*. Retrieved from <http://lady.163.com/special/sense/2013renwu05.html>
- 呂德文 (2012)。〈媒介動員、釘子戶於抗爭政治：宜黃事件再分析〉。《社會》，第3期，頁129-170。
- Lu Dewen (2012). Meijie dongyuan, dingzihu yu kangzheng zhengzhi: Yihuang shijian zaifenxi. *Shehui*, 3, 129-170.
- 夏倩芳、袁光鋒、陳科 (2012)。〈制度性資本，非制度性資本與社會衝突性議題的傳播〉。《傳播與社會學刊》，第22期，頁21-66。
- Xia Qianfang, Yuan Guangfeng, Chen Ke (2012). Zhiduxing ziben, fei zhiduxing ziben yu shehui chongtuxing yiti de chuanbo. *Chuanbo yu shehui xuekan*, 22, 21-66.
- 張永宏、李靜君 (2012)。〈製造同意：基層政府怎樣吸納民眾的抗爭〉。《開放時代》，第7期，頁5-25。
- Zhang Yonghong, Li Jingjun (2012). Zhizao tongyi: Jiceng zhengfu zenyang xina minzhong de kangzheng. *Kaifang shidai*, 7, 5-25.
- 張書軍、單媛 (2013)。〈與抗爭：農民維權方式的新變化〉。《閱江學刊》，第4期，頁33-39。
- Zhang Shujun, Shan Yuan (2013). Yiyu kangzheng: Nongmin weiquan fangshi de xinbianhua. *Yuejiang xuekan*, 4, 33-39.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9期(2019)

- 郭小安、劉明瑤(2016)。〈媒介動員視角下「表演式抗爭」的發生與劇目〉。《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第5期，頁76-80。
- Guo Xiao'an, Liu Mingyao (2016). Meijie dongyuan shijiaoxia "biaoyanshi kangzheng" de fasheng yu jumu. *Xiandai chuanbo (zhongguo chuanmei daxue xuebao)*, 5, 76-80.
- 曾繁旭、黃廣生(2013)。〈地方媒介體系：一種都市抗爭的政治資源〉。《傳播與社會學刊》，第24期，頁103-138。
- Zeng Fanxu, Huang Guangsheng (2013). Difang meijie tixi: Yizhong dushi kangzheng de zhengzhi ziyuan. *Chuanbo yu shehui xuekan*, 24, 103-138.
- 黃冬姪(2011)。〈國家如何塑造抗爭政治——關於社會抗爭中國家角色的研究評述〉。《社會學研究》，第2期，頁217-242。
- Huang Dongya (2011). Guojia ruhe suzao kangzheng zhengzhi—guanyu shehui kangzhengzhong guojia juece de yanjiu pingshu. *Shehuixue yanjiu*, 2, 217-242.
- 黃振輝(2011)。〈表演式抗爭：景觀、挑戰與發生機理——基於珠江三角洲典型案例研究〉。《開放時代》，第2期，頁71-84。
- Huang Zhenhui (2011). Biaoyanshi kangzheng: Jingguan, tiaozhan yu fasheng jili—jiyu zhujiang sanjiaozhou dianxing anli yanjiu. *Kaifang shidai*, 2, 71-84.
- 楊國斌(2009)。〈悲情與戲謔：網絡事件中的情感動員〉。《傳播與社會學刊》，第9期，頁39-66。
- Yang Guobin (2009). Beiqing yu xixue: Wangluo shijian zhong de qinggan dongyuan. *Chuanbo yu shehui xuekan*, 9, 39-66.
- 董海軍(2008)。《「作為武器的弱者身份」：農民維權抗爭的底層政治》。《社會》，第4期，頁34-58。
- Dong Haijun (2008). "Zuowei wuqi de ruozhe shenfen": Nongmin weiquan kangzheng de diceng zhengzhi. *Shehui*, 4, 34-58.
- 趙鼎新(2005)。〈西方社會運動與革命理論發展之述評〉。《社會學研究》，第1期，頁168-209。
- Zhao Dingxin (2005). Xifang shehui yundong yu geming lilun fazhan zhi shuping. *Shehuixue yanjiu*, 1, 168-209.
- 劉世鼎、史唯(2017)。〈被觀看的權利〉。《思想》，第31期，頁1-24。
- Liu Shih-ding, Shi Wei (2017). Bei guankan de quanli. *Sixiang*, 31, 1-24.
- 劉濤(2016a)。〈視覺抗爭：表演式抗爭的劇目結構與符號矩陣〉。《西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期，頁5-15。
- Liu Tao (2016a). Shijue kangzheng: Biaoyanshi kangzheng de jumu jigou yu fuhao juzhen. *Xibei shifan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ban)*, 4, 5-15.

抗爭表演的視覺框架：中國網絡名人的實踐經驗

- 劉濤 (2016b)。〈情感抗爭：表演式抗爭的情感框架與道德語法〉。《武漢大學學報 (人文科學版)》，第 5 期，頁 102–113。
- Liu Tao (2016b). Qinggan kangzheng: Biaoyanshi kangzheng de qinggan kuangjia yu daode yufa. *Wuhan daxue xuebao (renwen kexueban)*, 5, 102–113.
- 劉濤 (2017)。〈身體抗爭：表演式抗爭的劇場政治與身體敘事〉。《現代傳播 (中國傳媒大學學報)》，第 1 期，頁 62–67。
- Liu Tao (2017). Shenti kangzheng: Biaoyanshi kangzheng de juchang zhengzhi yu shenti xushi. *Xiandai chuanbo (zhongguo chuanmei daxue xuebao)*, 1, 62–67.
- 應星 (2011)。《「氣」與抗爭政治：當代中國鄉村社會穩定問題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Ying Xing (2011). “Qi” yu kangzheng zhengzhi: Dangdai zhongguo xiangcun shehui wending wenti yanjiu.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 Adams, J. (2002). Art in social movements: Shantytown women’s protest in Pinochet’s Chile. *Sociological Forum*, 17, 21–56.
- Arendt, H. (1959). *The human condition: A study of the central dilemmas facing modern man*. New York, NY: Doubleday.
- Benford, R., & Snow, D. (2000). Framing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 611–639.
- Blair, J. A. (2004). The rhetoric of visual arguments. In C. A. Hill, & M. Helmers (Eds.) *Defining visual rhetoric* (pp. 41–62).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Butler, J. (2006). *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s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New York, NY: Verso.
- Butler, J. (2011, September). Bodies in alliance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street. Retrieved December 16, 2015, from <http://www.eipcp.net/transversal/1011/butler/en>.
- Cai, Y. (2010). *Collective resistance in China: Why popular protests succeed or fail*.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stells, M. (2012). *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internet age*. Cambridge, UK; Malden, MA: Polity Press.
- Chen, X. (2012). *Social protest and contentious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hen, J. (1985). Strategy or identity: New theoretical paradigms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movements. *Social Research*, 52(4), 663–716.
- Corrigall-Brown, C. (2012). The power of pictures: Images of politics and protest.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6(2), 131–134.
- Dardis, F. E. (2006). Marginalization devices in U.S. press coverage of Iraq War protest: A content analysis.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9, 117–135.

- Delicath, J. W., & Deluca, K. M. (2003). Image Events, the public sphere, and argumentative practice: The case of radical environmental groups. *Argumentation, 17*(3), 315–333.
- Doerr, N., Mattoni, A., & Teune, S. (2013). Towards a visual analysis of social movements, conflicts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Research in Social Movements, Conflict and Change, 35*, xi–xxvi.
- Duncan, N. (Ed.) (1996). *Body/Space*. London, UK: Routledge.
- Eisinger, P. K. (1973). The conditions of protest behavior in American ci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7*(1), 11–28.
- Flam, H. (2005). Emotions' map: A research agenda. In H. Flam & D. King (Eds.), *Emo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pp. 19–40). London: Routledge.
- Gaby, S., & Caren, N. (2012). Occupy online: How cute old men and Malcolm X recruited 400,000 US users to OWS on Facebook.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11*(3–4), 367–374.
- Garrett, D. (2014). Superheroes in Hong Kong's political resistance: Images, icons, and opposition.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47*(1), 112–119.
- Goldman, M. (2005). *From comrade to citizen: The struggle for political rights in China*. Cambridge, U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oodwin, J., & Jasper, J. M. (2006). Emo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J. E. Stets & J. H. Turner (Eds.), *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 (pp. 611–630). New York, NY: Springer.
- Guidry, J. A. (2003). The struggle to be seen: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Brazi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16*(4), 493–524.
- Gurr, T. R. (1970). *Why men rebe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alfmann, D., & Young, M. (2010). War pictures: The grotesque as a mobilizing tactic. *Mobilization, 15*, 1–24.
- Howard, P., & Hussain, M. (2011). The upheavals in Egypt and Tunisia: The role of digital media. *Journal of Democracy, 22*(3), 35–48.
- Isaac, L. (2008). Movement of movements: Culture moves in the long civil rights struggle. *Social Forces, 87*, 33–63.
- Jasper, J. M. (1998). The emotions of protest: Affective and reactive emotions in and around social movements. *Sociological Forum, 13*(3), 397–424.
- Jasper, J. M. (2006). Motivation and emotion. In R. Goodwin & C. Tilly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ntextual political analysis* (pp.157–171).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uris, J. S. (2012). Reflections on #Occupy everywhere: Social media, public space and emerging logics of aggregation. *American Ethnologist, 39*(2), 259–279.
- Kharroub, T., & Bas, O. (2016). Social media and protests: An examination of Twitter images of the 2011 Egyptian revolution. *New Media & Society, 18*(9), 1973–1992.
- Khatib, L. (2012). *Image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The role of the visual in political struggle*. London, UK: I.B. Tauris & Co. Ltd.

抗爭表演的視覺框架：中國網絡名人的實踐經驗

- Khondker, H. (2011). Role of the new media in the Arab Spring. *Globalizations*, 8(5), 675–679.
- Lee, E. (2015). Space of disobedience: A visual document of the Umbrella Movement in Hong Kong.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16(3), 367–379.
- Lefebvre, H. (1974).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 Liao, T. F. (2010). Visual symbolism, collective memory and social protest: A study of the 2009 London G20 protest. *Social Alternatives*, 29(4), 37–43.
- Lin, Z. (2017). Contextualized transmedia mobilization: Media practices and mobilizing structures in the Umbrella Mov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1, 48–71.
- Mattoni, A., & Teune, S. (2014). Visions of protest. A media-historic perspective on images in social movements. *Sociology Compass*, 8(6), 876–887.
- McAdam, D., Tarrow, S. G., & Tilly, C. (2001). *Dynamics of contention*.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Adam, D. (1982).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cCarthy, J. D., & Zald, M. N. (1977).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 parti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1212–1241.
- Melucci, A. (1989). *Nomads of the protest: Social movements and individual need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Merriam, S. (1998).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case study applications in education*.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Publishers.
- Migdal, J. S. (2001). *State in society: Studying how states and societies transform and constitute one another*.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iller, D., & Sinanan, J. (2014). *Webca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Mitchell, W. J. T. (2012). Image, space, revolution: The arts of occupation. *Critical Inquiry*, 3 (1), 8–32.
- Morrison, D. R., & Isaac, L.W. (2012). Insurgent images: Genre selection and visual frame amplification in IWW Cartoon Art.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11(1), 61–78.
- Nathan, A. J. (2003).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14(1), 6–17.
- Nelson, L. (1999). Bodies (and spaces) do matter: The limits of performativity. *Gender, Place & Culture*, 6(4), 331–353.
- Nissenbaum, A., & Shifman, L. (2015). Internet memes as contested cultural capital: The case of 4chan's /b/ board. *New Media & Society*, 19(4), 483–501.
- O'Brien, K. J., & Li, L. (2006).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New York, NY;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Brien, K. J. (2009). *Popular protest i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erry, E. J., & Goldman, M. (Eds.) (2009). *Grassroots political reform in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hilipps, A. (2012). Visual protest material as empirical data. *Visual Communication*, 11(1), 3–21.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9期(2019)

- Rancière, J. (2004). *Disagreement: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Rovisco, M., & Veneti, A. (2017). Picturing protest: Visuality, visibility and the public sphere. *Visual Communication*, 16(3), 271–277.
- Scott, J. C. (1987).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London, UK; New Heaven, DE: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kinner, J. (2012). *The interview: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Oxford, UK: Berg.
- Skocpol, T., Evans, P., & Rueschemeyer, D. (1999).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New York, NY;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ake, R. E. (2000). Case studies. In N. Denzin & Y.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 Stamou, A. G. (2001). The representation of non-protesters in a student and teacher protest: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news reporting in a Greek newspaper. *Discourse and Society*, 12, 653–680.
- Tai, Z. (2015). Networked resistance: Digital populism, online activism, and mass dissent in China. *Popular Communication*, 13(2), 120–131.
- Tang, G. (2015). Mobilization by images: TV screen and mediated instant grievances in the Umbrella Movement.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 338–355.
- Tapias, M. (2015). *Embodied protests: Emotions and women's health in Bolivia*.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Tarrow, S. (1988). National politics and collective action: Recent theory and research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4(1), 421–440.
- Tarrow, S. (1998).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illy, C., & Tarrow, S. (2006). *Contentious politics*. Boulder, CO: Paradigm Press.
- Tilly, C. (2000). Spaces of contention.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September 2000*, 5(2), 135–159.
- Tilly, C. (2006). *Regimes and repertoire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Tilly, C. (2008). *Contentious performances*.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Yang, Y. (2016). How large-scale protests succeed in China: The story of issue opportunity structure, social media and viol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0, 2895–2914.
- Yin, R. (2003).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本文引用格式